论古埃及遗产与埃及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文化重塑*

王　泰　余鸿浩

摘　　要：古埃及遗产是埃及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历史资源和文化载体。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考察，其作用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在反殖民主义背景下，古埃及遗产首次同埃及民族国家建设相结合，但由此产生的法老主义脱离民众基础，很快走向衰落。第二阶段从1952年七月革命到2011年，埃及开启共和体制下民族国家的再构建，古埃及遗产并未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核心，使用上体现出明显的选择性与工具性，经历了符号化、尝试性复兴和非政治领域的体系化应用。第三阶段自塞西执政起，古埃及遗产全面融入“新共和国”国家认同塑造，完成从实用工具向国家核心叙事的转变，成为埃及凝聚国民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依托。上述百年演变，本质上是埃及随时代变化持续调适、重构国家身份的过程，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文化战略自主的体现，为文明古国依托传统文化遗产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

关 键 词：法老主义；埃及；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塞西时代

作者简介：王泰，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世界史研究所教授（通辽 028000）；余鸿浩，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通辽 028000）。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6-0069-19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编《列国志·埃及》（2025LGZ01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LSYZD21021）《埃及卷》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内蒙古自治区世界史学科提档升级建设项目的支持。

近年来,从“法老的黄金游行”活动到大埃及博物馆开馆,塞西政府将古埃及遗产深度融入国家治理的各个维度,引发人们对民族国家构建中文化问题的深层思考。作为著名文明古国,埃及拥有无与伦比的文明遗产,但由于古埃及文明在时间上早于伊斯兰教、在文化上异于阿拉伯传统,长期难以被简单地纳入伊斯兰—阿拉伯认同框架。如何运用古埃及遗产贯穿近现代埃及民族国家构建的全过程。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中提出,民族认同本质上是对历史遗产的持续复制与重新阐释。① 换言之,现代民族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依托历史遗产完成身份构建,遗产的使用方式比遗产本身更为关键。

一、溯源与断裂:近代反殖背景下法老主义的兴起与式微

塞西政府对古埃及遗产的系统性运用,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本土民族意识的觉醒。该时期,本土知识分子跳出阿拉伯—伊斯兰单一历史叙事,将目光投向被遗忘千年的古埃及文明,以其为根基开启了埃及民族国家的初步构建进程。

(一) 从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到法老主义的兴起

19 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开启了埃及的现代化改革,欧洲思想文化涌入埃及,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培养出来,其中就有启蒙思想家、史学家里法阿·塔赫塔维(Rifā'ah al-Tahtāwi),其首部埃及史著作《高贵的陶菲克在埃及和以赛玛利子孙的故事中的光辉》(*Anwār Tawfīq al-Jalīl fi Akhbār Misr wa-Tawthiq Bani Ismā'il*)以法老时期作为开端,打破以往阿拉伯史家将伊斯兰教的诞生作为史书开端的传统,②表达了对法老文明的高度认同和强烈自豪。有学者认为,该书的面世标志着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③ 塔赫塔维曾是埃及首份正式报纸《埃及时事报》主编,他通过报纸向国内年轻人传播现代民族意识,呼吁埃及复兴,④并以实际行动保护古埃及遗产。穆罕默德·阿里在统治前中期对古埃及遗产漠不关

①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0 页。

②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王晴佳、[美]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杨豫、[美]王晴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1 页。

③ Jamal al-Din al-Shayyal, *A History of Egypt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exandria: Alexandr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3.

④ 江淑君:《里法阿·塔哈塔维教育思想及其启蒙精神》,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第 28 页。

心,纵容欧洲人随意处置古埃及文物,[①]后在塔赫塔维劝说下,他于 1836 年开始保护各大遗址,同时建造博物馆展示古埃及文物,不再任其流往欧洲。[②] 以上种种都为法老主义的出现打下基础。

法老主义还因以下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兴起。第一,19 世纪中后期本土埃及学在现代化改革的深化中诞生,古埃及知识在埃及传播,埃及人持续一千多年漠视古埃及遗产的态度逐渐转向关心。[③] 第二,奥拉比起义、英国镇压该起义后趁势占领埃及的行为、丹沙微事件等,都刺激着埃及民族主义情绪。第三,20 世纪初埃及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崛起,新式刊物大量涌现,西方世俗法律、社会治理及宪政理念逐步传入埃及。第四,一战进一步激发埃及民族主义。战时英国对埃及采取了极端的控制和压榨,引发埃及民众强烈不满;同时战争客观助推埃及民族资本发展。[④] 第五,战后全新国际环境助推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因遭战争重创,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力度减弱;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给埃及民族主义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

面对埃及独立的呼声,英国殖民当局极力否定埃及人具有独立民族身份。英国殖民者将埃及视为若干穆斯林社群的集合,断言这些社群无法整合为一个民族,[⑤]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勋爵更是认为,埃及过去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民族,未来也不可能形成。[⑥] 作为应对,文学泰斗塔哈·侯赛因、小说家陶菲克·哈基姆(Tawfiq al-Hakim)、作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Muhammad Husayn Haykal)、政治家穆斯塔法·纳哈斯(Mustafa al-Nahhas)等埃及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法老主义,主要内容如下:埃及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埃及民族;埃及民族有别于阿拉伯民族;现代埃及人与古埃及人本质是同一民族;埃及民族与希腊、罗马等其他地中海民族具有同质性,因此埃及人是欧洲人;埃及必然独立并将再创辉煌。[⑦]

1919 年,华夫脱党与英国谈判时提出“埃及或许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埃及

---

① Michael Wood, “The Use of the Pharaonic Past in Modern Egyptian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Vol. 35, 1998, pp. 189-190.

② Michael Wood, “The Use of the Pharaonic Past in Modern Egyptian Nationalism,” p. 180.

③ 袁指挥:《论法老民族主义与埃及学》,载《中东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57-60 页。

④ [加纳]A. 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1880 至 1935 年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中译本,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版,第 274 页。

⑤ Anshuman A. Mondal, *Nationalism and Post-Colonial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143.

⑥ 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98.

⑦ 袁指挥:《论法老民族主义与埃及学》,第 63-67 页。

“具有辉煌的过去,具备独立治理的能力”①等观点,要求埃及完全独立,然而英国不但拒绝,还逮捕和流放了埃及谈判代表,激起了埃及全国的抗议和罢工,即 1919 年革命,英国被迫于 1922 年承认埃及独立。同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在帝王谷发现了图坦卡蒙陵寝,独立与该重大发现形成强烈共振,使法老主义迅速成为主流思想。

在政治层面,1924 年华夫脱党执政后不久就派人控制了图坦卡蒙陵寝及其出土文物,时任总理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强调“政府有责任保卫民族的权利和尊严”。② 1923 年,埃及古物局就德国考古学家博尔夏特(Ludwig Borchardt)擅自将文物带离埃及的行为提出抗议,要求其归还文物。③ 美国埃及学家布雷斯特德曾建议埃及政府建立一座新博物馆,得到埃及政府积极回应,但该计划终因民族主义者反对而流产,因为其要求博物馆建成后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掌管 30 年。④

在教育与学术层面,1921 年,埃及政府选拔萨利姆·哈桑(Selim Hassan)等赴欧深造。哈桑后来成为埃及首位本土埃及学教授,他推动开罗大学开设了埃及学专业,在埃及多地进行考古发掘,并撰写多篇高水准英、法文著述。埃及政府于 1923 年在高等师范学院创建了第四所埃及学学校,埃及学学校后并入埃及大学并升级为埃及学系,成为培养本土埃及学家的摇篮。“本土埃及学之父”艾哈迈德·卡迈勒(Ahmed Kamal)在高等师范学院设立了专门部门培养古埃及史教师。

在社会层面,大量文艺创作融入古埃及元素,小说、戏剧、音乐、雕刻作品纷纷取材法老历史,官方邮票也采用相关主题。大批民众参观法老时代建筑,政府部门也组织拜谒活动。新闻媒体更是充斥着古埃及相关内容,如政府领导人对考古遗址的视察、古埃及历史、现代埃及文化中的古埃及因素,以及古埃及对希伯来、欧洲的影响等。⑤

(二) 法老主义的式微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起,许多法老主义者逐渐放弃原有立场,转而拥抱伊斯兰与阿拉伯元素。塔哈·侯赛因从 1927 年开始强调伊斯兰文化,从 1933 年起呼

①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Egypt, Islam, and the Arabs: The Search for Egyptian Nationhood, 1900-1930*,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2.

② Michael Wood, “The Use of the Pharaonic Past in Modern Egypti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Vol. 35, 1998, p. 183.

③ Donald M. Reid, “Indigenous Egyptology: The Decolonization of a Profess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5, No. 2, 1985, p. 238.

④ Michael Wood, “The Use of the Pharaonic Past in Modern Egyptian Nationalism,” p. 183.

⑤ 袁指挥:《论法老民族主义与埃及学》,第 73-75 页。

吁用欧洲文学方法审视阿拉伯文学,希望民众恢复对阿拉伯文学的兴趣。① 海卡尔从1929年起不再仅强调法老时代,认为应把伊斯兰教也纳入埃及历史范畴,从中寻找埃及的民族精神。② 20世纪30年代初,他发表一系列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文章,主张在伊斯兰框架内吸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同时批判了西方价值观。③受此影响,华夫脱党也调整路线,在1936～1937年与亚洲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④在1939年又参加了旨在解决巴勒斯坦人民起义问题的伦敦会议,党首纳哈斯还在此时尝试建立阿拉伯联合组织,1942年后,该党进一步接近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强调埃及将承担起领导阿拉伯国家的责任。⑤ 在知识界、政界的巨大影响下,社会各界也丧失了对古埃及的兴趣。

法老主义的迅速衰落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一千多年的伊斯兰化让埃及伊斯兰教信仰根深蒂固,而法老在伊斯兰传统中被视为暴君。多数人无法认同法老主义。20世纪30年代起,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虔诚的他们排斥流行于城市的法老主义,大部分知识分子为迎合他们转而宣传伊斯兰文化。同时,教育的扩张让越来越多出身中下阶层的学生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其西化程度低于前辈,更倾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⑥对法老主义的态度以批判为主。

第二,自由主义时期出现了诸多问题。埃及1922年的独立有名无实,因为英国仍在埃及驻军。法老主义希望通过推崇法老文化交好欧洲,但没有实质效果,列强仍阻止埃及获得完整主权。20世纪30年代起,埃及出现了国王试图重新专权和腐败、枉法、选举造假等问题⑦,同时经济遭到大萧条重创,人们开始质疑自由主义制度,作为附属的法老主义也遭到放弃。

第三,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埃及人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目的多是学术考察、实地调研、传道、商贸等,而非朝觐。1926年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学生团体开始到埃及游

---

① Charles D. Smith, *Islam and the Search for Social Order in Modern Egypt: A Biography of Muhammad Husayn Hayk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p. 94.

② Ibid., pp. 90, 97, 99.

③ Charles D. Smith, "The Intellectual and Modernization: Defini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 The Egyptian Experienc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2, No. 4, 1980, p. 517.

④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Redefining the Egyptian Nation, 193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6.

⑤ Ankush B. Sawant,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terest in Egypt,"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2 (1985), pp. 141－142.

⑥ Haggai Erlich, *Students and Univers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Egyptian Politics*, London: F. Cass, 1989, p. 99.

⑦ [埃及]陶菲克·哈基姆:《乡村检察官手记》,杨孝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101页。

学,随后几年这类活动的次数持续增加。① 20 世纪 30 年代初,埃及成立了几个旨在促进阿拉伯文化交流的组织。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量移民到埃及的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在落户后不久就创办杂志,宣扬阿拉伯民族主义。排斥阿拉伯特性的法老主义愈发不受欢迎。

第四,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发生的一些负面事件也令埃及知识界大失所望。大萧条、德意法西斯崛起、英法绥靖政策重创西方形象,埃及知识分子由此认定西方已衰落。如哈基姆在小说《东方之鸟》中提出,东方精神文明胜过西方物质文明,只有东方才能解决埃及当前问题。② 文学批评家艾哈迈德·哈桑·扎耶特(Ahmad Hasan az-Zayyāt)认为,欧洲正在走向战争,将自取灭亡,这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③ 他们不再宣扬西化,法老主义也随之被抛弃。

法老主义的式微标志着埃及首次以古埃及文明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构建尝试的终结,证明了脱离群众基础的精英主义叙事难以承担凝聚全体国民的重任。尽管如此,这一短暂的实践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经验:古埃及文明拥有成为民族认同资源的潜力,可激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问题在于如何在古埃及遗产的独特性与伊斯兰—阿拉伯传统的民众性之间找到合适的衔接点。

二、重启与积淀:现代埃及对古埃及遗产的恢复和功能性运用

1952 年七月革命后,埃及进入共和制框架下的民族国家再次构建阶段。1952~2011 年,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三任总统虽在内政外交路线上有明显不同,但古埃及遗产始终未回归官方意识形态核心,其在该时期主要以工具形态服务于国家建设,运用范围逐步扩大、体系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文物主权、外交形象、文旅经济、社会认知等领域完成了长期积淀,为塞西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重构埋下伏笔。

(一) 纳赛尔时期

纳赛尔时期民族国家构建的目标,是超越埃及本土边界,建立以埃及为领导的统一阿拉伯民族国家。在此背景下,法老主义从官方意识形态中基本退出,但古埃及遗产并未沉寂,而是被纳赛尔政府巧妙地工具化,服务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新生共和国合法性构建,呈现"去政治化、重象征化"特征。

对内,纳赛尔总统利用古埃及遗产为新政权赋予历史深度。1954 年,纳赛尔

①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Redefining the Egyptian Nation*, *1930-1945*, pp. 24-25.

② [埃及]海卡尔:《埃及小说和戏剧文学》,袁义芬、王文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0-125 页。

③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Redefining the Egyptian Nation*, *1930 - 1945*, p. 49.

总统下令将拉美西斯二世巨像立在开罗市中心火车站前,以此宣示新生共和国与古埃及一脉相承。[①] 1961 年开罗塔建成开放,其下层入口台阶和塔基用阿斯旺花岗岩镶嵌而成,而几乎所有古埃及遗址中都发现过这种花岗岩,[②]其中暗含文明传承寓意。七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埃及皮阿斯特(Piaster)硬币上的法鲁克一世肖像被狮身人面像取代,之后十余年,埃及中央银行又发行了多版埃及镑,纸币图案有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图坦卡蒙雕像等,水印则采用了狮身人面像、埃及书记官雕像等图案,这些符号主要作为国家标识存在,但未伴随相应文化宣传。

对外,古埃及遗产的运用则服务于国际形象塑造。1954 年,埃及决定建设阿斯旺高坝,但大坝蓄水后将淹没库区诸多古迹,纳赛尔总统下令开展保护工作,然而埃及因资金、技术与人才的限制无法独立完成,于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求助。在该组织号召下,有 113 个国家向埃及伸出援手,1960 年到 1980 年,40 多次大规模抢救行动在阿斯旺地区展开,22 座庙宇被化整为零拆散后,转移到安全地带重建。[③] 借助此次行动,埃及树立起遗产守护者的形象,获得巨大国际声望,也巩固了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此外,纳赛尔时期还完成了文物管理和本土埃及学的去殖民化。近代以来,本土埃及学长期被西方国家操控,如 1858～1952 年的埃及文物局一直被法国人掌控,七月革命后,埃及古物局及开罗大学的埃及学教学、科研工作全部改由埃及人从事,本土埃及学自此独立,在纳赛尔时期取得了发掘并复原太阳船、发现希腊罗马人墓区的重大成就。[④] 不过这些成就在当时主要是服务于国家荣誉,未促进“埃及民族”认同的构建。

总之,纳赛尔时期古埃及遗产的独特性被弱化,这种弱化并非是对古埃及遗产的忽略和否定,其象征意义被融入“阿拉伯民族”的共同荣耀与反帝叙事中,依然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虽是以“埃及”为本体的民族国家构建的低潮,但古埃及遗产的主权回归为未来运用扫清了巨大障碍。

(二) 萨达特时期

萨达特总统上台后,开启了以去纳赛尔化为主的全面改革,放弃泛阿拉伯统一愿景,转向埃及国家利益优先,古埃及遗产的运用也随之出现试探性突破,呈现“功能拓展、重本土化”特征。

在对外层面,古埃及遗产成为强调国家尊严的工具。1976 年,拉美西斯二世

① 林建杨、吕迎旭:《古埃及法老“搬家”,总统卫队护驾》,载《新华每日电讯》2006 年 8 月 26 日,第 7 版。

② 《驻足在埃及邂逅阿斯旺——探访神秘的埃及神庙》,载《建筑与文化》2013 年第 12 期,第 122-126 页。

③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沧桑的尼罗河》,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22 页。

④ 王海利:《本土埃及学发展探析》,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4 期,第 151 页。

木乃伊出现问题,经萨达特总统与法国总统德斯坦协商后,埃及决定将木乃伊运往巴黎进行研究和修复,在萨达特总统要求下,木乃伊抵达戴高乐机场时,法国以国家元首规格举行迎接仪式。① 对内层面,萨达特总统则较为谨慎,如为了不冒犯伊斯兰教而关闭开罗博物馆的木乃伊展厅(也有观点认为此举是对法老的尊重),②弱化法老文化宣传。不过,其对古埃及遗产仍有明显运用。1975 年建成的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阵亡将士的埃及无名英雄纪念碑,造型为 4 根空心斜柱交汇合成金字塔状,有“当代金字塔”之称,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后亦安葬于此,墓前卫兵身穿古埃及风格服饰。③ 20 世纪 70 年代起,批判纳赛尔主义的文字作品在萨达特总统支持下出现,其中不少推崇古埃及文明,如尼玛特·艾哈迈德·福阿德(Ni'mat Ahmad Fu'ad)的《重写历史》(*A'idu Kitabat al-Tarikh*),猛烈抨击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以古埃及文明为核心,重塑埃及的历史脉络与身份认同,④这些观点虽未得到政治实践,但可看作是为日后古埃及遗产的运用提供了思想预热。

泛阿拉伯主义的失败,以及萨达特总统与美国、以色列的和解,使埃及官方立场发生了细微变化,埃及重新开始关注法老因素,尽管萨达特总统并未有利用古埃及遗产进行本土民族国家构建的倾向,但其本国优先道路的选择,毕竟打破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国家叙事的垄断,为古埃及遗产服务于“埃及”这一主体的国家认同构建,重新打开了政治空间。

(三) 穆巴拉克时期

穆巴拉克总统执政后继续“埃及优先”方向,以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该时期古埃及遗产的运用突破了此前零散、试探的状态,形成了覆盖外交、文化、经济、学术的体系,实现了在非政治领域的深化,呈现“产业化、大众化”特征。

在外交层面,古埃及遗址和博物馆被作为国家外交舞台。2004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1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参观了埃及国家博物馆。2006 年 6 月 17 日晚,中埃建交 50 周年庆祝活动在尼罗河畔吉萨高地上的金字塔前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时任总理温家宝与埃及时任总理纳齐夫出席。2009 年 6 月 4 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访问埃及,其间参观了吉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在文化层面也有多方面举措。一是启动大埃及博物馆项目。1992 年,埃及

① Michael Wood, “The Use of the Pharaonic Past in Modern Egyptian Nationalism”, p. 186.

② Ibid.

③ 黄培昭:《萨达特的长眠地》,新浪新闻,https://news.sina.com.cn/w/2005-03-09/09176030211.shtml,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④ S. Selim, “The New Pharaonism: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Egyptian Village Novel, 1967-1977”, p. 14.

政府将建设埃及大博物馆列为国家项目,时任文化部长法鲁克·胡斯尼(Farouk Hosny)负责具体执行,他认为“博物馆不是遗物仓库,而是民族精神的居住空间”,“将它们汇聚一堂,将唤醒这群教导世界永恒意义的民族的集体记忆”。[①] 二是推动古埃及文物出国巡展。2006 年 5 月,“埃及沉没的宝藏”古埃及文物展在柏林马丁-葛罗皮乌斯博物馆(Martin-Gropius-Bau)举办,500 多件展品均打捞自亚历山大港附近海域,穆巴拉克总统亲赴柏林主持展览开幕式,该展后来还在巴黎和伦敦举办。[②] 2004～2011 年,图坦卡蒙墓中部分文物一直在海外巡展,许多考古学家称赞这是对埃及遗产的良好且免费的推广,还有人将其视为修复文物和建设博物馆的资金来源。[③] 三是通过多种方式加强文物保护。埃及政府于 1983 年修订颁布《文物保护法》,加大对损毁文物行为的惩罚力度,2010 年,埃及议会又通过了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再次强化文物保护措施,尤其加强了对不文明现象的打击力度;埃及政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物展览、讲座、研讨会等活动,增强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并利用璀璨的古代文物来提升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2002 年,埃及成立“归还文物总局”,从海外追回了一批文物,2007 年又成立“追回文物联合委员会”,通过谈判、外交、参加竞拍、法律等手段,追回大批珍贵文物,[④]如 2009 年 12 月 14 日,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将一件珍贵的古埃及文物当面交还给正在法国访问的穆巴拉克总统,再如 2010 年 3 月 5 日,埃及时任文化部长胡斯尼宣布,约 2.5 万件古埃及文物从英国伦敦大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⑤]

在文化话语权方面,对古埃及文明的形象进行了捍卫。外界长期存在许多关于古埃及的误解与不实传言,埃及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通过一系列工作驳斥了这些论调。2002 年 8 月 4 日,时任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的哈瓦斯根据 10 余年的挖掘和研究宣布,从埃及金字塔建造者的生活设施遗迹和墓葬情况可判断出,他们是拥有自由身的劳工,而非奴隶,这颠覆了金字塔由奴隶建造的

① H. Badrawi, “The Meeting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Grand Egyptian Museum,” *Ahram Online*, October 31, 2025,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4/0/555939/Opinion/The-Meeting-of-Past,-Present,-and-Future--The-Gran.aspx,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② 里克:《触摸埃及艳后生前用品“埃及沉没的宝藏”开展(图)》,中国经济网,2006 年 5 月 12 日,http://www.ce.cn/culture/news/200605/12/t20060512_6932888.shtml,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③ N. El-Aref, “The Fate of Tutankhamun's Touring Exhibition”, *Ahram Online*,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9/40/18945/Heritage/Ancient-Egypt/The-fate-of-Tutankhamuns-touring-exhibition.aspx,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④ 黄培昭:《埃及多措并举加强文物保护》,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 年 1 月 29 日,https://cssn.cn/gjgc/hqxx/202401/t20240129_5731155.shtml,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⑤ 刘芳:《论埃及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制度》,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8 页。

西方传统观点;[①]1922～1935 年,21 名直接或间接参与图坦卡蒙陵墓发掘的人员相继“离奇”死去,“法老诅咒”传言随之兴起,针对这一说法,哈瓦斯经检测指出,各法老陵墓内充满了可致癌的氡气,这可能是导致当年部分考古人员集中去世的原因。[②]

整体而言,穆巴拉克时期古埃及遗产运用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行政与产业体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但基本只活跃在文化、经济、外交等领域,未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层。长达三十年的常态化保护、开发与传播,让古埃及文明脱离了精英圈层局限,在社会层面完成了认知积淀,为塞西时期的深度运用奠定了社会基础。

三、高扬与塑造:古埃及遗产与“新共和国”叙事的双向奔赴

自执政以来,塞西总统跳出 1952 年以来的阿拉伯单一叙事,回归古埃及文明根脉,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各维度推出了一系列依托古埃及文明的国家举措,开启“新共和国”民族国家构建新历程。

(一) 塞西政府对古埃及遗产的运用

塞西政府突破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仅将古埃及元素当作外交、文旅符号的局限,将古埃及文化遗产全方位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认同塑造的各个维度,使其成为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载体。

第一,运用古埃及遗产资源举办大型文化仪式,塑造集体历史记忆、凝聚国民情感。2021 年 4 月 3 日,埃及举办“法老的黄金游行”,将 22 具古埃及王室木乃伊从埃及博物馆迁至埃及文明博物馆,场面恢宏。埃及第一夫人英蒂萨尔·塞西(Intisar el-Sisi)在这次活动上表示,她对属于一个古老文明感到自豪。[③] 同年 11 月 25 日,埃及向公众开放了拥有 3,000 年历史的狮身人面像大道,并举行了一场华丽的仪式,塞西总统及多名国内外政要出席了此盛会。

第二,将文化遗产保护与身份建构列入国家顶层发展战略,提供制度性与政策性支撑。2023 年更新版《埃及 2030 愿景》将“丰富文化与体育生活”作为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核心目标之一,明确埃及的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是国家财富的重要基础,兼具塑造国民文化身份、传承历史记忆的社会价值,以及提升经济附加值、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多重功能。针对当前各地区文化设施不足、公众文化意识薄弱等现实问题,该愿景规划了系统性实施路径:加大文体领域财政投入,在

① 邵杰、刘云非:《谁建造了埃及金字塔?》,载《新华每日电讯》2002 年 8 月 6 日,第 8 版。

② 《“法老咒语”原是氡气作怪?》,载《北京晨报》2003 年 10 月 8 日。

③ K. J. Anderson, “How Egypt's Grandiose Neo-Pharaonism Lends Legitimacy to Its Strongman,” *The New Arab*, November 23, 2021, https://www.newarab.com/opinion/egypts-grandiose-neo-pharaonism-and-strongman-politics,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各省及新建城市扩建公共文化设施,保障全体居民的文化权益;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化与可持续利用,释放其在认同建构、创意经济中的价值;将文化传承与遗产保护纳入教育体系,培养青少年的遗产保护意识与文化自豪感;完善文化产业与知识产权制度,推进文旅融合与数字化转型,缩小区域文化差距;系统培养各领域创新人才,为文化长远发展积累人力资本。①

第三,推动大埃及博物馆建成开放,打造民族国家构建标志性文化地标。2025 年 11 月 1 日,历时 20 余年建成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正式开馆,各国元首及政府首脑、地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参加了当晚的开馆仪式,塞西总统为大埃及博物馆揭幕并发表致辞,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埃及文明)的博物馆,该馆不仅是保存珍贵文物的场所,更是埃及人民智慧的鲜活见证,正是这种智慧,让埃及人民建造了金字塔,在神庙墙壁上镌刻了不朽传奇。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 50 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 10 万件。②

第四,将古埃及元素融入重大建筑、公共工程与文体赛事。2018 年 10 月,埃及宣布将在新行政首都建造名为“首都方尖碑塔”的大楼,③其外观采用方尖碑的形式,建筑立面以埃及睡莲图案为装饰,睡莲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尼罗河流域,是古埃及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符号。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6 月,埃及政府改造了开罗解放广场,改造后的广场上竖起了一座拉美西斯二世的方尖碑,其四周还摆放了四尊从卡纳克神庙搬来的狮身羊面像。2023 年 2 月和 3 月,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分别成功发射了荷鲁斯 1 号和 2 号遥感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埃及,中国为其提供研制和火箭代发服务,荷鲁斯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天空之神和法老守护神。2019 年,埃及举办了非洲国家杯足球赛,官方吉祥物名为“图特(Tut)”,形象为儿童法老,设计灵感来自图坦卡蒙。

第五,多方位捍卫文化主权,掌握历史叙事话语权。塞西政府继续追索流失海外文物,如埃及政府于 2025 年从美国追回 36 件被走私出境的文物④、荷兰于 2026 年 2 月向埃及归还一件 3,500 年前文物⑤等,考古学家哈瓦斯于 2019 年组建

---

① *Egypt's Vision 2030: The National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pdated Version), Cairo: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23, pp. 65-68.

② 姚兵、董修竹:《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新华网,2025 年 11 月 2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1102/29ea31fa2aca4115a906b1816150ef57/c.html,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③ T. M. Sakr, “Egypt to Build One of the World's Tallest Towers, Surpassing Burj Khalifa”, *Egyptian Streets*, October 18, 2018, https://egyptianstreets.com/2018/10/18/egypt-to-build-one-of-the-worlds-tallest-towers-surpassing-burj-khalifa/,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④ 吴爱民:《埃及从美国追回 36 件文物》,央视网,2025 年 11 月 7 日,https://news.cctv.com/2025/11/07/ARTI5XwQ76nQ34KjNRK96hd0251107.shtml,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⑤ 央视新闻客户端:《荷兰向埃及归还一件 3500 年前文物》,央视网,2026 年 2 月 6 日,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2384185628507951721,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了一个团队,声索 5 件极为珍贵的文物。[①] 2023 年的网飞(Netflix)纪录片《法老克里奥佩特拉》(Queen Cleopatra)中,克里奥佩特拉七世由一位黑人女演员饰演,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对此发表声明,指出历史上的克里奥佩特拉七世肤色较浅、拥有希腊特征,并谴责该剧是"对埃及历史的伪造"。[②]

第六,持续拓展古埃及文物海外巡展,以文明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拉美西斯与法老黄金"(Ramses and the Pharaohs' Gold Exhibition)全球巡展始于 2021 年 11 月的休斯敦,2022 年 8 月移至旧金山,2023 年 4 月登陆巴黎,2023 年 11 月到访悉尼,2024 年 7 月进驻科隆,2025 年巡展东京,2026 年落地伦敦,埃及旅游与文物部部长谢里夫·法特希(Sherif Fathy)在伦敦站开幕式上致辞表示,该展是埃及文化外交的成功实践,彰显了古埃及文明跨越时代、启迪世界各民族的恒久影响力。[③] 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8 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这是有史以来全球规模最大、亚洲等级最高的古埃及文物出境展,也是中国官方博物馆首次与埃及政府合作、全面揭秘古埃及文明及其最新考古发现的世界顶级文物展。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8 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这是香港迄今规模最大、展期最长的古埃及文物展。

综上,塞西政府对古埃及遗产的运用并非零散的政策拼凑,而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三层体系。认同塑造层(大型文化仪式、国家顶层战略、大埃及博物馆、国家重大建筑与文体赛事)解决"我们是谁"的情感与象征问题,将古埃及遗产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国民情感体验;制度保障层(《埃及 2030 愿景》中的文化条款、文物追索机制)解决"如何持续"的制度与政策问题,将文化认同嵌入国家治理的制度框架;对外传播层(海外巡展、文化主权捍卫、历史叙事话语权争夺)解决"如何被世界看见"的软实力与战略自主问题,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国际影响力。三个层次由内而外、层层递进:认同塑造提供情感基础,制度保障提供持续机制,对外传播提供国际空间。

(二) 塞西政府运用古埃及遗产的原因

塞西时期对古埃及遗产的系统运用是历经中东剧变之后,重新思考国家身份和埃及百年国家身份构建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

① 沈丹琳:《埃及为追索流失文物密织"大网"》,载《环球》2023 年第 20 期。

② F. Kapetopoulos, "Egypt Calls Netflix Cleopatra Doco 'a Falsification of Egyptian History and a Blatant Historical Misconception'," *Neos Kosmos*, April 29, 2023, https://neoskosmos.com/en/2023/04/29/news/world/egypt-calls-the-netflixs-cleopatraa-falsification-of-egyptian-history-and-a-blatant-historical-misconception/,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③ *Ramses and the Pharaohs' Gold Exhibition 2026*,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 27 February, 2026, https://sis.gov.eg/en/media-center/events/ramses-and-the-pharaohs-gold-exhibition-2026/,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历史方面,从19世纪中期本土学者塔哈塔维的启蒙思想到20世纪初法老主义思潮兴起,再到1952年后三届政府的政策铺垫,跨越近两个世纪的思想积淀与实践探索,为塞西时期利用古埃及遗产推动民族国家构建奠定了思想、制度、物质与社会共识的全方位基础。19世纪中期,塔哈塔维首次以埃及人视角将古埃及和伊斯兰埃及、近现代埃及联系起来,把对古埃及的认同和民族国家构建相绑定;法老主义虽昙花一现,但它是第一次将古埃及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身份深度关联的国家级别实践,为后世提供宝贵借鉴;纳赛尔时期完成了古埃及文物主权的去殖民化,终结了西方对埃及考古与文物管理的控制,解决了法老遗产"谁来守护、谁来阐释"的问题;萨达特时期规划的首先解决埃及自身问题的道路,打破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国家叙事的垄断,为本土文明叙事的发展释放了空间;穆巴拉克时期建成了完善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和文旅产业链,培养了全民对古埃及文明的基本认知和情感认同。

政治方面,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消解与防范伊斯兰主义的需求,共同构成了塞西总统拥抱古埃及文明的政治动因。阿拉伯民族主义自第三次中东战争惨败后陷入衰退,又经萨达特时期的去纳赛尔化改革,至中东剧变后,已严重衰落,[①]埃及官方意识形态出现巨大真空。2012年,来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的穆尔西经全国大选上台,使伊斯兰主义有机会填补该真空,然而,2013年7月,塞西以军方名义罢黜了穆尔西,随后军方主导的临时政府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对其全面镇压,[②]这决定了伊斯兰主义只会被塞西政权严加抵制,绝无可能再被试图纳入埃及官方叙事。此外,穆兄会短暂执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物价攀升、药品缺乏、世俗化程度倒退、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宗教民族矛盾激化等,加大了社会层面对伊斯兰主义势力执政的不满,以至于穆尔西下台后,穆兄会发起的抗议活动不被多数民众支持,[③]由此,遏制伊斯兰主义具备巩固自身政权与顺应民意的双重属性。在此背景下,古埃及文化遗产成为能够同时满足填补意识形态真空与防范伊斯兰主义的理想选择。

经济方面,古埃及文化资源的系统性运用可有力推动旅游业发展。旅游业是埃及重要产业,2024/25财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3.7%,2025年埃及接待游客近1,900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酒店数量约1,300家、旅游公司数量约2,

① 何志龙:《论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63页。

② 廖百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与现实——把脉中东政治伊斯兰走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196页。

③ 廖百智:《埃及"穆兄会"垮台原因及前景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8期,第34页。

240 家、旅游车辆数量超 1.7 万辆。[①] 塞西政府关于古埃及文化遗产的政策成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引擎,改变了此前依赖遗迹观光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以大埃及博物馆为核心的文明地标体系建设,不仅实现了文物展示空间的升级,更构建了一个集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使游客能够沉浸式感受古埃及文明。“法老的黄金游行”、狮身人面像大道开放仪式等,为埃及旅游业提供了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宣传。

文化方面,塞西政府力图以古埃及文明为基底,构建超越宗教与族群边界的文化认同,同时提升国家软实力。中东剧变后,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势力之间出现尖锐对立,社会严重撕裂,而古埃及文明是埃及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历史遗产,不受宗教信仰、政治立场和族群身份的限制,因而可作为凝聚全民共识的文化纽带。与此同时,依托古埃及文明掌握历史叙事主导权、捍卫文化主权,也能助力埃及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国转变为全球文化大国,以文化软实力强化国家战略自主。

(三) 对所谓“新法老主义”论的评析

有学者用“新法老主义”称呼塞西时期的古埃及文化政策,[②]这一概念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将该政策视为法老主义的改良版复刻,二是指控该政策有“种族主义”“威权主义”倾向。本文认为,法老主义和塞西文化政策在兴起背景、主导力量、意识形态等方面差异巨大,两种主义的指控也缺乏扎实证据。

从兴起背景与核心使命看,法老主义兴起于被殖民时期,以反抗英国统治、推动埃及民族独立为主要任务,其目的是通过强调古埃及文明的独特性来证明埃及具有独立的资格。塞西时期的文化政策则诞生于中东剧变后的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与国家认同危机,核心使命是重构政权合法性、弥合社会撕裂、推动经济发展,二者所处历史阶段与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

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法老主义以摆脱英国等殖民势力为目标,是反殖民斗争的思想武器。塞西时期则积极开展跨国合作,借助外部资源推动文化传播,在提升埃及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也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跨文明交流事业贡献了埃及力量。

---

① 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4/25 财年埃及旅游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创近十年新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2026 年 5 月 15 日,https://eg.mofcom.gov.cn/ajhgjj/art/2026/art_8aae5d61f6964de694ced40fe9ed605c.html,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② K. J. Anderson, “How Egypt’s grandiose neo-Pharaonism lends legitimacy to its strongman”, *The New Arab*, November 23, 2021, https://www.newarab.com/opinion/egypts-grandiose-neo-pharaonism-and-strongman-politics, 上网时间: 2026 年 7 月 2 日; TIMEP Contributor, “Egypt’s Racial Nationalism: Neo-Pharaonism as a Tool of the State”, *The Tahrir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Policy*, September 20, 2023, https://timep.org/2023/09/20/egypts-racial-nationalism-neo-pharaonism-as-a-tool-of-the-state/, 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从主导力量来看,法老主义由民间知识分子主导,依靠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报刊宣传等进行传播,影响力基本局限于城市精英,缺乏国家政权和广大群众的坚定支持。塞西时期的文化整合则直接由国家政权主导,总统亲自推动,多部门协同实施,形成多方位互相支撑的体系,影响力覆盖全国上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方面,二者差别最为突出,这也是法老主义迅速失败而塞西时期文化政策能够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核心原因。法老主义具有排他性与激进性,为突出埃及本土性而弱化伊斯兰与阿拉伯属性,主张埃及民族与欧洲民族同源,呈现全盘西化倾向,此叙事难获广大穆斯林认同。塞西时期则在推广古埃及文明的同时,提出"新埃及人"概念,力图包容各类不同文明,以实现和谐共处,在该概念中,埃及的民族认同被塑造为由以下七大支柱共同支撑的多元文明复合体:法老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科普特文明、伊斯兰文明、阿拉伯属性、地中海属性与非洲属性。① 除提出概念外,塞西政府还做出诸多行动加以配合,主要体现在对科普特人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动伊斯兰宗教界更加包容。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Tawadros II)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8 年两次受邀参加塞西总统的就职典礼,被安排在与爱资哈尔大教长同等重要的嘉宾席位上。2015 年 1 月 6 日,塞西总统前往圣马可科普特东正教大教堂(Saint Mark's Coptic Orthodox Cathedral)参加圣诞弥撒,成为首位亲临该仪式的埃及总统,塞西总统在仪式上发表简短讲话,强调埃及国民不应细分自身身份,杜绝"你属于哪类埃及人"的想法。② 这番表态意在申明:应超越宗教与文化分歧,维系统一共通的公民身份。此后的 2016～2026 年,他每年都参加圣诞弥撒。③ 在首次亲临圣诞弥撒的数天前,塞西总统还在爱资哈尔大学演说,呼吁伊斯兰宗教群体自我革新,根除偏执狭隘思想,树立更开明的世界观。④ 受此影响,伊斯兰宗教界以更包容的姿态对待不同文化和信仰。2019 年,爱资哈尔发布宗

① O. Winter & A. Shiloah, "Egypt's Identity During the el-Sisi Era: Profile of the 'New Egyptian',"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21, No. 4, 2019, p. 65.

② "AFRICA/EGYPT-President al-Sisi attends Coptic Christmas Mass at Cairo Abbasiya Cathedral," *Agenzia Fides*, January 7, 2015, https://www.fides.org/en/news/37048, 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③ "President El-Sisi During His Nativity Greetings: 'No One Should Ever Try to Divide Us or Cause Us Harm or Harm to Our Country ... His Holiness the Pope Holds a Special Place of Esteem and Deep Respect'," *Coptic Orthodox Church*, January 6, 2026, https://copticorthodox.church/en/2026/01/06/president-el-sisi-during-his-nativity-greetings-no-one-should-ever-try-to-divide-us-or-cause-us-harm-or-harm-to-our-country-his-holiness-the-pope-holds-a-special-place-of-esteem-and-deep-respect/, 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④ Agenzia Fides, "AFRICA/EGYPT-President al-Sisi attends Coptic Christmas mass at Cairo Abbasiya Cathedral", January 7, 2015, https://www.fides.org/en/news/37048, 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教法令,倡导穆斯林与基督徒宽容共存。① 由此及彼,伊斯兰宗教界也会包容对待古埃及遗产。

至于两种“主义”的指责,“种族主义”指责包含两层内容,一是把法老主义和同期欧洲种族主义运动相关联,推定当代政策承袭了种族主义思想,二是指责埃及刻意消解自身的非洲属性,由此催生出埃及网络排斥黑人的言论;“威权主义”指控则将大型文化仪式解读为塑造“新法老”强人形象的表演,认为埃及政府借用古埃及历史填补意识形态缺口,以此完成政权合法性包装,甚至将整套文化工程视作转移国内民生矛盾的手段。本文认为这两种指控都缺乏支撑:法老主义是反殖民运动,始终没有发展出种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塞西政府的文化政策落脚点是文化归属感的塑造,而非血统意义上的种族认同,“新埃及人”框架容纳阿拉伯、伊斯兰、非洲等多重维度,并未舍弃其中任何一部分,网络上部分极端言论是网民个人想法,不等同于官方立场,埃及政府也从未出台支持种族排斥的政策;依托本土历史遗产凝聚国民认同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治理方式,埃及复兴古埃及认同的举措,客观上承担弥合国内教派分歧的社会功能,同时直接服务文旅产业发展,带动就业与外汇收入,具备切实的民生经济价值,此外,国家元首出席本国重大活动属于国际惯例,这类活动不是领导人强化自身权威的工具。总之,“新法老主义”不算是严谨的学术探究,而是一种针对塞西文化政策的较为偏颇的政治批判话语。

(四) 国内外各界反响与面临的挑战

塞西政府推行的古埃及文明相关政策,获得国内外广泛好评。各方普遍认为,该政策不仅重塑埃及国家形象,更在凝聚民族共识、推动文化传承、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内民众层面,相关实践获得普遍支持,显著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与对古老文明的自豪。2021 年“法老的黄金游行”结束后,社交平台上充满了埃及民众的自豪感,大多埃及人认为投入资金举办该活动是值得的,因为这可带来更丰厚的旅游收入,还有人表示,在经历苏伊士运河堵塞、“3·26 火车相撞事故”等灾难后,通过这样一场盛会可振作埃及人的精神。② 2025 年大埃及博物馆的开馆也让埃及人十分兴奋和自豪,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大量展示了自己扮演法老的 AI 肖像,人群聚集在广场通过大屏幕观看博物馆开馆仪式,还有许多人在大埃及博物

① “Al-Azhar Says Muslims May Greet, Exchange Gifts with Christians During Holidays”, *Ahram Online*, January 1, 2019, https://english. ahram. org. eg/NewsContent/1/64/321021/ Egypt/Politics-/AlAzhar-says-Muslims-may-greet,-exchange-gifts-wit. aspx,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② K. Tabikha, “Egypt Royal Mummies Parade: National Pride Surges after Historic Procession,” *The National News*, April 8, 2021, https://www. thenationalnews. com/mena/egypt/egypt-royal-mummies-parade-national-pride-surges-after-historic-procession-1. 1197065,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馆对面的街道上跳舞。① 纪录片《法老克里奥佩特拉》上映后,埃及青年们指责该片“歪曲埃及历史”,并在网络平台上发起了旨在展示古今埃及人相似之处的“埃及人代表埃及”运动,他们纷纷分享这样的合成照片:一半是自己的脸,一半是古埃及的法老、王室成员等的面容。② 亚历山大图书馆文物博物馆馆长侯赛因·阿卜杜勒-巴西尔(Hussein Abdel-Basir)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指出,塞西政府对埃及身份和遗产的关注“在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并强调“建设未来不能脱离了解埃及历史、为文明自豪及保护遗产”。③

国际社会近年来对埃及的各类文化活动和工程的态度也多为赞赏,相信其能为保护和传承古埃及文明发挥重要作用。“法老的黄金游行”获得了国际社会各方的热情关注和积极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出席了此次仪式,阿曼、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希腊等国也公开祝贺和称赞。④ 大埃及博物馆的开馆也是如此。2025 年 11 月 1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塞西总统致贺信,祝贺大埃及博物馆开馆,相信其将在埃及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保护和传承古埃及文明发挥重要作用。⑤ 此外,五大洲的数亿观众观看了博物馆的开馆仪式,215 个国际媒体对此有 705 则重大报道,报道的标题大多为“埃及令世界惊艳”“开罗点亮世界”以及“21 世纪重新定义博物馆”等。⑥ 这些国际认可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埃及国民的文化自信,使其对自身文明的价值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不过,塞西的文化政策也面临挑战。其一,埃及是发展中国家,在医疗、就业、教育等民生领域长期存在压力,如何平衡文化项目与民生,考验政府能力;其二,埃及伊斯兰传统仍根深蒂固,如何将其与古埃及叙事调和,也还存在问题;其

① N. Sayed, “‘Egyptian and Proud’,” *Ahram Online*, November 5, 2025,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P/64/556238/GEM-opening/%E2%80%98Egyptian-and-proud%E2%80%99.aspx,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② M. Makary, “Young Egyptians Create Viral Campaign Against Netflix’s ‘Queen Cleopatra’,” *Egyptian Streets*, May 1, 2023, https://egyptianstreets.com/2023/05/01/young-egyptians-create-viral-campaign-against-netflixs-queen-cleopatra/,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③ 《亚历山大图书馆文物馆馆长:塞西总统对埃及身份与遗产的重视前所未有》(阿拉伯文),载《第七日报》2026 年 9 月 21 日,上网时间:2026 年 9 月 25 日。

④ “The World Congratulates Egypt for Its Golden Parade,” *Egypt Independent*, April 4, 2021, https://www.egyptindependent.com/the-world-congratulates-egypt-for-its-golden-parade/,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⑤ 《习近平就大埃及博物馆开馆向埃及总统塞西致贺信》,中国外交部官网,2025 年 11 月 2 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511/t20251102_11745541.shtml,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⑥ “Grand Egyptian Museum Mania Goes Global: 705 Stories, 215 Outlets, One Historic Night,” *Ahram Online*, November 3, 2025,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556131.aspx,上网时间:2026 年 7 月 2 日。

三,塞西政府投入巨资举办大型文化盛典、打造文明地标,很大程度上意在通过发展文旅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但中东局势长期动荡,易冲击埃及旅游业,使得巨额投入存在效益不稳、甚至付诸东流的隐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古埃及遗产已是当代埃及国家认同构建的核心资源。

四、结语

回顾埃及百余年民族国家建设历程,对“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的解答始终离不开对古埃及遗产的探索。从 19 世纪成为民族意识觉醒的文化符号,到纳赛尔时代被融入泛阿拉伯的宏大叙事,再经萨达特时代和穆巴拉克时代在本国优先道路下的运用,至塞西时代作为民族国家叙事的核心,它的起伏清晰地描绘了埃及民族认同演变的历史轨迹。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为第一阶段。塔赫塔维首次将古埃及文明纳入本土民族叙事,开启了遗产与国家构建绑定的思想先河。20 世纪初,在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推动下法老主义思潮兴起,1922 年埃及名义独立后一度成为华夫脱党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但由于脱离社会根基与大众宗教,这套叙事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迅速式微,最终被阿拉伯民族主义取代,首次以古埃及为核心的国家构建尝试走向终结。

七月革命后,埃及进入第二阶段,试图在共和制框架下再次构建民族国家,古埃及遗产也随之进入工具化调适与制度积淀期。纳赛尔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埃及为本位的民族叙事转入低潮,古埃及遗产被转化为服务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新生共和国合法性的实用符号,不再承担认同核心的功能。进入萨达特时期,在去纳赛尔化改革的推动下,“埃及优先”成为施政的核心立场,古埃及遗产的运用出现试探性恢复,但仍未突破工具的定位。穆巴拉克时期,遗产运用走向常态化与体系化,虽基本仅施展在外交、文旅、文物保护等领域,但在制度建设、产业发展与社会认知层面完成了长期积淀。

2011 年中东剧变爆发,原有阿拉伯本位的国家叙事彻底瓦解,国家认同危机全面凸显。塞西执政后,突破此前历任执政者的工具化局限,将古埃及遗产全方位嵌入国家认同的重新构建之中,开启了遗产运用的第三阶段,实现了古埃及文明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再次深度绑定。与排他性的法老主义不同,塞西时期的文明整合建立在六十余年的制度与社会积淀之上,采取温和包容的叙事策略,以全民共有遗产为纽带消解身份对立,这也是塞西总统相关政策没有重蹈法老主义覆辙、能够突破精英圈层在全社会广泛推广的核心原因。当然,塞西时期的实践仍面临文化投入与民生改善的平衡、古埃及叙事与伊斯兰传统的深层调和等现实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埃及遗产已深度嵌入当代埃及国家构建的整体脉

络,成为凝聚国民共识、强化历史认同、提振文化自信的关键文化资源,并将持续对埃及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百年实践表明,埃及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持续调适、不断重构的动态进程,古埃及文明作为埃及独有的文化资源,具备超越教派与族群边界的强大凝聚力。埃及依托本土古文明重构国家认同的探索,也为广大后殖民国家摆脱对外部意识形态的依赖、挖掘自身历史根脉、构建自主民族国家身份,提供了重要启示。

放眼世界,很多来自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都在依托本土古代文明重塑国家认同。在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自 2014 年莫迪执政以来加速推进,以印度教文明为基底重构国家叙事,强调印度文明的连续性与本土性,①其逻辑与埃及以古埃及文明为基底构建“新埃及人”认同有相似之处,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具有强烈排他性,②“新埃及人”概念则试图包容多元文明。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将金帐汗国纳入国家叙事,乌兹别克斯坦则认同帖木儿帝国,二者均试图以古代文明资源填补苏联解体后的意识形态真空,其背景与埃及阿拉伯剧变后的处境高度相似。在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以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强化本国在西亚北非、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等地区的影响力,试图重现奥斯曼帝国的“荣耀”,③其对外战略的自主取向与埃及文化主权战略异曲同工。

这些案例表明,全球南方国家依托本土古代文明重构国家认同,具有若干共同逻辑:一是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在原有官方意识形态(阿拉伯民族主义、苏联共产主义、凯末尔主义等)衰落或瓦解后,古代文明成为替代性认同资源;二是强化政权合法性,通过将自身与辉煌的古代文明相连接,为现政权赋予历史深度与正当性;三是体现战略自主,以文化主权摆脱外部意识形态依赖,提升本国国际话语权。埃及案例的独特性正在于:古埃及文明在世界上拥有无与伦比的知名度,这使埃及的文化主权战略具备更强的国际传播潜力;同时,埃及的“新埃及人”概念采取多元文明复合体的包容性叙事,而非单一宗教或族群的排他性叙事,这使其在弥合社会撕裂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责任编辑:赵　军　责任校对:李　意)

① 张忞煜:《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 Hindu 族群建构与印度历史书写》,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第 101 页。

② 王靖雅:《印度教民族主义对莫迪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25 年,第 22 页。

③ 林海虹:《土耳其中东战略转型的三重制约》,载《光明日报》2025 年 8 月 8 日,第 12 版。